

第十九話

四房軼事



十世

許葉芬 號少雀  
樂平泉 號印川  
又名清安

十一世

樂季繁 號樹滋

十二世

樂達仁 七老爺  
樂達義 十老爺  
樂達明 十三老爺  
樂達德 十六老爺

十三世

樂釗 十九老爺  
樂錡 二十老爺  
樂錚 十三老爺  
樂肇基 十一老爺  
樂鏞 早夭  
二十二老爺

十四世

樂士銘 獨子  
樂大春 長子  
樂大年 次子  
樂大中 三子  
樂士驥 獨子  
樂藍 獨子

樂氏家譜之四（四房）

## 樂家老鋪頭名企業家——樂達仁<sup>1</sup>

在樂氏十二世及十三世家族中，在中藥業取得最優異成就是筆者的七伯父樂達仁先生。他是一位十分精明強幹的人。他之所以發憤圖強，期望實業救國，是在八國聯軍入侵中國之後，親睹國之屈辱，深感切膚之痛，從而激發了他的愛國之心。

在二十歲前，達仁與一般富家子弟並無二致。樂家人有聽京劇和鼓曲的傳統習慣，他也有涉獵。他看到西洋鐘錶汽車等先進的機械物品的精巧技術，有意到西歐各國去開開眼界，長長見識。於是他於一八九七到一九〇一年到德國等歐洲國家遊學長達四年。他是在清光緒年間，以德國和荷蘭大使呂海寰的隨員身分出國的。在此期間，他學到很多知識，考察了德國著名企業，尤其是拜耳藥業公司，他們的安裝設備、管理辦法、人員配備到工人培訓等，各方面都有成熟的經驗。出國後期正趕上八國聯軍之亂，他目睹了中國外交官在國外的困境，中國官員在外國人面前屈膝卑躬，弱國無外交，面對不平等條約，只能點頭稱是。這些都深深地激發了樂達仁的愛國之心，他知道了只有國家富強了，中國人才能有尊嚴，從此開始有了實業救國的想法。回國後，他老老實實地到同仁堂當一名學徒工。學成專業後，在外地開設達仁堂時，哪裡缺少人手，他都可以個頂個

1 本文參考楊國瑄《達仁堂的故事》，天津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五月版。

地當一名稱職的藥業師傅。

筆者少年時曾親見七伯父樂達仁於一九二〇年書贈十七弟（筆者父親）的《弁言》。當時父親年僅十齡，是剛讀書不久的蒙童，是不能完全領會七伯父對同仁堂的良苦心血的。七伯父的《弁言》是寫給以幼弟為首的樂門子姪的。七伯父似乎是用一枝禿筆，寫在一張灑金的橙黃宣紙上，字跡整齊，一手楷書樸實無華。他告誡自己的子姪，不要只知道錦衣玉食，忘記祖上的努力和奮鬥。

樂達仁從舊日故紙堆中發現，早年間樂家祖輩在乾隆、嘉慶及道光時不斷地典當同仁堂的財產，以致樂平泉接手同仁堂時，僅剩約百分之一的股份。《弁言》文曰：

達仁自更事以來，即書吾家各房養尊處優、席金履厚者，胥於我公共之同仁堂是賴，殊不知同仁堂自前清初葉創設以來，其間事變更迭，吾先人固已耗盡幾許心血，經過幾許挫折，始能完全留遺至今也。蓋不獨傳諸口說，竊嘗於故紙堆中得有確實證據者三面……

十七弟惠存

達仁謹識

七伯父達仁讓人把上述三紙典當同仁堂文本裱糊起來，懸於座右。開始樂達仁還想重整同仁堂，呼籲各房遵從祖製、嚴肅家規，切勿幹那損公肥私之事。他的號召首先得到與他一起讀書、玩耍、親密無間的同庚堂兄六哥樂達莊等人的支持；無奈當時傳統的封建勢力還是家中的主流，墨守成規的長輩們不但不接受他的合理建議，反倒指責他說：「你眼中還有長輩嗎？」「你以為你是誰呀！現在是到了該你說話的時候了嗎？」總之，達仁想要力挽狂瀾、重振同仁堂的想法未能達成，他只得另闢蹊徑。一九一二年，他在北京大柵欄開辦了「京都達仁堂樂家老藥鋪」，又經過幾起幾落，煞非容易地在天津估衣街開設了達仁堂總號和幾家分號。一九二〇年，達仁堂已經能夠做出一定成就，樂達仁仍不忘老櫃同仁堂，以三紙廢舊文書和一篇《弁言》諄諄告誡後生晚輩，同仁堂之有今日來之不易，大家必須慎之、愛之。

《弁言》有「序言」之意。但此文是他二弟（小排行）十伯父樂達義接管同仁堂的有力鋪墊。一九三一年，樂達義掌管同仁堂，使它走上了正規的軌跡。

說樂達仁憂憤，從文中有「家事鋪事紛亂已達極點」一句可見一斑。同時，他的意見長輩的確不能理解，當時兄弟子姪依然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他很是無奈。但是老四房開設的達仁堂已經站穩了腳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這些鐵的事實證明，達仁的意見完全正確。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老四房之間的團結，不論是十二世的老哥兒四個，還是十三世的小哥兒四個（老五樂錯中學時病故），在樂氏家族中都是楷模。樂達仁從自身

做起，只拿紅利的四分之一。

樂達仁經常教誨子姪，對兩個年長的姪子樂肇基及樂松生格外關心，培養他們早日成材。兩人不負先輩期望，成為達仁身後達仁堂的經理與副經理。樂達仁始終關心同仁堂的興衰，希望早日終止樂家內部的不團結。他一再諄諄教導子姪各自讓一步，搞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新章程，這才有了真正四大房共管的局面。一九二〇年九月，他書贈十七弟（先父樂東屏，比達仁年少三十三歲）的《弁言》中提到：「……殊不知同仁堂自前清初葉創設以來，其間事變更迭，吾先人固已耗盡幾許心血，經過幾許挫折，始能完全留遺至今也……故將先世所遺之廢據合同（清時各先祖典租同仁堂與外姓）分送各房昆季子姪各存一紙。」「自吾等祖母棄世以後，同仁堂在表面觀之，似乎根深柢固，不可動搖，究其內容，實因各房昆季心志渙散，故家事鋪事紛亂已達極點……（達仁）迄今稍有成就，差比自立。回顧我公共之同仁堂，其紛亂較前為甚，自愧弗材，無術挽救。然及今同心努力，出而維持，尚未為晚。務望我昆季子姪同心同德，不吝既往，各自讓步，重新立一完善規則，庶祖宗艱難締造之事業，不至蕩然無存也。」

《弁言》的大意是說到了樂家十二世，富足安穩的生活已經過了幾十年，很多人已經不思進取，安於現狀，只想個人能從同仁堂多拿一點。達仁認為從表面上看，同仁堂似乎根深柢固，不可動搖，其實昆季心志渙散，故家事紛亂已達極點。達仁當時從故紙堆中找出幾份廢舊合同，是乾隆、嘉慶以及道光時期樂家前輩典當同仁堂的舊物。達仁非

常警覺，他想大家若是繼續挖同仁堂牆腳，終有一天會使乾嘉道三朝的舊事重演。所以達仁寫了《弁言》，名為教導子孫，實為告誡全家大小。他以前朝同仁堂瀕於絕境的事例為依據，無疑是對眾人擊一猛掌，雖不能立竿見影，但對本性善良、在一段時間內利慾薰心、只顧個人利益的各位是一劑非常有用的清醒劑。再者用現在的話說，這時達仁已經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他的話對樂家很有分量，而且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一九〇一年，樂達仁自歐洲回來，目睹京城斷壁殘垣的悲慘景象和無家可歸的難民露宿街頭。他決定從頭學起，在後櫃跟隨裘續齋學習基本功。裘師傅是一位中藥知識非常淵博、技術上很全面的人，在當時同仁堂是權威之一。樂達仁每天起早貪黑與員工一起幹活，又那麼謙虛認真，有問題就問，深得裘師傅的喜愛，他對達仁不明白之處都詳盡地予以解答。十五伯父樂詠西受到樂達仁在同仁堂當學徒、後來成功創建達仁堂的啟發，他讓二子元可與孝先到頤齡堂當學徒三年。不期然他們都是走的先繼承、再改革發揚的路子。兩者是同一事物相輔相成的兩個階段，是不能斷然分開的。

樂達仁最為重要的觀點是必須進行中藥改革，借鑑國外經驗技術，這些意見是正確的。現在中國醫藥事業正在蓬勃發展，中藥也已步入現代化、國際化的階段。在達仁堂取得輝煌成就時，拜耳藥廠找上門來，希望與達仁堂合作。達仁的意見是新廠址設在天津，拜耳堅持新廠址設在青島。雙方又在誰是主要負責人等問題上未能達成一致，協定無疾而終。

樂達仁在經營達仁堂上有一觀點，那就是達仁堂的藥品必須是優質高價。達仁堂的產品看起來都那麼精神漂亮，正宗藥材乾淨整齊，飲片又分南刀北刀。南刀切出的郁金、木通薄如蟬翼，好看美觀。總之，達仁堂的產品是精益求精，堅持了「地道、純潔、上等」的原則。

憶起當年樂平泉曾在京城修挖河溝之際，在溝燈上寫「同仁堂」三個大字，樂達仁就沿用此法，辦起了達仁樂隊。他旅歐時對交響樂情有獨鐘，乃選用二十名達仁堂青年員工學習樂器，請海關管弦樂隊人員到達仁堂給予具體指導。不久，「達仁堂樂家老藥鋪音樂隊」的大旗就在天津展開了。樂隊成員有兩套衣服，喜慶事穿紅色服裝，喪事則穿白色服裝，領章處一律有「達仁」二字。他們「不收費，二不在主家用餐，連飲用水都自備。一時間，達仁樂隊有了很好的聲譽。

七伯父樂達仁是一位愛國企業家，多行義舉。二十世紀二〇年代初，天津學校較少，女子學校就更少。達仁想繼承祖上做慈善公益的傳統，辦一所免費女子小學，幫助貧苦家庭的女孩學習文化，接受初等教育。當時馬千里先生是著名社會活動家和教育家，五四運動時，他被選為天津各界聯合會副會長，一九二〇年一月與周恩來同志一起被警察局拘捕，長達半年。達仁拜訪馬千里，說：「平民家的女孩子大都無條件讀書，若一代一代的母親都是文盲，國家不是太可悲了嗎？因此我想捐款興學，懇請先生出任校長，不知意下如何？」馬千里先生說：「樂先生拳拳愛國之心，讓兄弟殊為感動！」舊社會



多年的封建統治，認為「女子無才就是德」。這是女人的不幸，更是國家的大不幸。普及女子教育正是馬先生的夙願，而且他想辦一所新型女子學校。兩人一拍即合，商定達仁堂出資六百元，但不干涉學校的一切事務。馬千里出任校長後，謝絕了報酬，絕對的義務辦校。當時的教員主要是校長夫人張冠時女士，她的兄長就是赫赫有名的南開中學校長張伯苓先生。他們兄妹對教育事業都有極大熱情。馬校長不在時，由一位十八歲的女老師代理校務，她就是鄧文淑——鄧穎超。解放後，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大姊還幾次問過樂松生關於達仁女校的情況。

鄧穎超，曾就讀於直隸女子學校，與馬千里有師生之誼。五四運動時，她積極地參加各種運動，投身於革命中，成為津門聞名的女革命家。一九二二年，她應馬校長之邀來到達仁女校。女校辦得有聲有色，開有公民常識課，講人生觀和婦女解放問題。她們還特別注意課外實習活動，成立了女童子軍，學習軍事知識和拉練，到達仁堂藥廠及植物園參觀，為地震災民縫製棉衣。五卅慘案紀念日，她們還組織學生上街遊行。達仁女校主張自由、民主、進步，辦得生動活潑。馬千里和鄧穎超的進步思想及他們為祖國、為人民的精神很快地傳到了下一代。樂達仁身為校董，當然清楚他們之所作所為。他在心裡擁護他們的行動，同時也清楚在當時環境下自己承受的風險，但他依然關心學校的有關事宜。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上午，他仍到校參加討論五七國恥日，到南開大學參加師生大遊行的組織會議。

鄧穎超同志在達仁女校工作期間，一九二四年一月入團，一九二五年三月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在此近三年內，她曾作為天津十名代表之一，慰問北上的孫中山先生。在五卅運動中組織工、商、學各界，在南開廣場舉行市民大會，並以大會主席身分做了報告，抗議帝國主義暴行。一九二五年七月，鄧大姐奉黨的指示，前往廣州開展婦女運動。鄧穎超及馬千里等進步人士的一系列革命活動得到社會上廣泛的讚譽，同時也引起反動當局的注意。他們一再向樂達仁施加壓力，他被迫於一九二六年底，在達仁女校操場上舉行了悲壯的休課儀式。

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樂達仁還曾辦過達仁鐵工廠。那時他看到天津內河航運出現了小火輪船，就讓達仁鐵工廠試製火輪。一九二八年春，該廠製造了九艘小火輪船，在新開河入水。

一九三四年，七伯父樂達仁病逝，享年五十八歲。他自幼熟讀經書，曾說：「達仁也者，通曉仁學之謂也。余既有達仁之名，當更有達仁之實。」他一生也確實是這樣做的。

筆者從未見過七伯父，從照片上看，他是一位相貌端莊、凜然正氣的紳士。高挑的身材，稍顯清瘦，戴一老式茶色眼鏡，留有八字鬚及山羊鬚。他有兩位夫人，大夫人無所出；二子三女均為二夫人所生。長子樂釗，在四房排行老三，在全家大排行中為十九爺。次子樂錡，在四房排行老四，在大排行中為二十一爺。長女申生；次女衛生，早夭；三女名錦。筆者曾與申生姊邂逅一次。二十世紀五〇年代，我們同去小經廠劇院預購譚富英、

裘盛榮合演的京劇《將相和》戲票時相遇，彼此談了幾句，但不知都是樂家人。直到看完戲，有人告訴筆者，那就是申生大姊。

七伯父旅歐時認識了一位女教師，後延請至北京家中教育兒女們學習英語。最後學者只有十五姑之女程莊表姊，後來她在育英中學教授英語。

## 樂達德和他的子女們

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初，老四房搬離了老宅，七伯父樂達仁把北樓留贈給筆者的父親。他們搬到什剎海前街。這裡原來是清朝大貪官和坤的宅地，光緒時又賜給了恭親王，此宅是在恭王府前院的基礎上建造的。王府的前院原是馬廄和草料場，民國時賣給了樂家老四房。因達仁堂總號在天津，故七老爺樂達仁家在天津。十老爺樂達義也因風水先生的意見，另在東城史家胡同安家。十三老爺樂達明之子樂肇基身為達仁堂副總經理，故也在天津居住。因此長住北京什剎海前街的，只有十六老爺樂達德一家了。解放後，郭沫若在此住了十幾年，現該地改為郭沫若紀念館。

在樂家十二代中，樂達德排行為十六，是樂季繁的幼子。他身高體瘦，長臉戴一副黑框眼鏡，短分髮向外滋生，難成髮型。其妻體胖大眼，一派富貴相，看上去就是瘦先生胖太太的一對了。他們有一子三女。長女九小姐樂倩文，酷似其母，中年時一照鏡子，

自己也會驚呼：「這不是樂劉韻蘭又復生了嗎！」第二個出生的是兒子，按四房排行是五爺樂錯，乳名小利生，父母鍾愛至甚。他面貌清秀，聰穎異常。第三個和第四個孩子仍是女兒，她們是十小姊樂盼文和十一小姊樂絢文。親人們都叫樂絢文大一。她胖乎乎的，大眼似其母又強於其母。一九一二年，十六老爺樂達德的長兄七老爺樂達仁創建達仁堂時，達德和夫人也曾全力以赴，拿出個人全部積蓄和夫人的陪嫁首飾。在達仁堂開業不順，屢遭失敗，達仁欲投黃浦江時，達德也曾痛哭流涕，並說：「不管買賣好與壞，都不要難為七哥了！」充分體現了四房人兄友弟恭的精神。除此之外，樂達德對藥業的建樹就不多了。達仁堂發達後，十六老爺每年享用達仁堂四分之一的紅利，稱為樂氏家族中享樂型的一個代表。筆者弟兄出生時，他高興地說：「這回可好了，也有人稱我為伯父了，再不是司空見慣的『十六叔』了！」日本侵略者占領北京時，他五十多歲就病逝了。

十六太太是個大嗓門，愛說愛笑。筆者祖母生日是農曆七月二十一，可她和女兒們六月二十一就來祝壽，原來是他們的生日記錄本記載有誤。他們的兒子樂錯十幾歲時在育英中學（今北京二十五中學）就讀，品學兼優。當時正是「九一八」之後，日寇搶占了東北，全國人民義憤填膺，這時育英中學選派樂錯錄了一首抗日歌曲，並灌成唱片，因為他在當時已小有名氣，唱片很受歡迎。未久他因病夭折，育英初中部有一水塔，該校遂將那個水塔命名為「樂錯塔」。樂達德痛失愛子，能做的事情只有給他立一塊風光的

墓碑了。他到西郊外遴選墓碑，最後為兒子選了一塊外形和質地均屬一級的碑石，遠比他身後的墓碑強。

十六老爺的女兒樂倩文中學就讀於貝滿女中，高中畢業後又考入輔仁大學。這時日本人已發動盧溝橋事變，愛國學子紛紛參加自己組成的抗日組織。當時倩文的男友是偽商會會長的兒子，又是愛國組織抗日鋤奸團的領導者（該組織好像還叫「鐵血愛國團」），倩文和男友都是該團的骨幹份子。一天晚上，偽商會會長請日本侵略者的頭頭吃飯，倩文男友認為這是行刺的好時機，於是就闖入宴會廳行刺。機警的日本人躲在他父身後，並以此父為擋箭牌，數槍未中，倩文的男友飲彈自盡。倩文則在刺殺大漢奸王克敏事件中出過力。倩文與王克敏之女為輔仁同學，當時倩文以同學身分到王家玩，暗記王家宅內布局，為暗殺王克敏提供情報，後為日偽份子發現。一九四〇年倩文被捕，急壞了樂家人。十老爺樂達義曾在北京員警廳當督察長，由他找到舊日老關係，又花了一大筆錢，偽警察局找到日本人說項通融，倩文雖經刑訊，總算不久即予釋放。

倩文既失愛侶，又遭牢獄之災，不得不有所收斂。自此之後，她成了樂姓四大房的常客。她還吊吊搭搭地上輔仁大學，大約有十年之久。此時她上大學不為學位，似乎只是為了交友。

倩文和妹妹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常用抗日鋤奸團的密語交談。密語本是鋤奸團規定使用的語言，外人根本不懂。聽知情人介紹，該密語是中文拼音加英文字母的一種語言，

例如「王」，是「屋」和「昂」的拼音，再加上英文字母「V」與「A」，遂把「王」說成「屋V昂A」。筆者與十七兄樂樸蓀之子樂慶森在匯文中學初一時是同班同學（慶森是國民黨三青團團員）。一天，他與倩文用密語交談幾句，倩文說：「噢！你也會這個！」後來慶森告訴我，北宋徽、欽二帝被擄時囚於井下，每日坐井觀天，父子被逼無奈，從而創出密語雛形，後來此密語有了新的發展。抗戰勝利後，據說軍統局還來找過倩文，請她參加軍統，被她拒絕了。她說：「當時我們參加抗日鋤奸團因為愛國，今天和平了，我們願過正常人的生活。」

在此前後，倩文家中常開派對，倩文官稱九姊。她在家中養一棗紅軍馬，可能是日本人留下的。一次一位女同學騎此馬摔成了腦震盪；此馬路過一菜床子時，主人往往給予胡蘿蔔、青菜等馬愛吃之物。棗紅馬在此菜站驟停，索要愛吃之物，女士不知，因而摔倒。還有一次，倩文到筆者家中看筆者父母，帶來的竟是陳舊食品。筆者甚是不解，母親告訴筆者，此乃別人送她，她又轉送。筆者奇怪的是：樂鏞去世後，倩文頂替他每年得達仁堂紅利的五分之一，何以送此不堪之物？

倩文在男友殺敵未果捐軀後的十幾年裡，再不談婚論嫁，直到她三十六歲時巧遇倪尹明九姊夫，二人很快成婚。婚後倩文告訴筆者說：「我們是王八看綠豆——對了眼兒了！」婚後他們得二女，高齡產婦，先兆流產。倩文得此二女實非容易，每胎均臥床六、七個月。她三十七歲得長女，四十三歲得次女。

文化大革命前，為了讀東城的好學校，家人把筆者兒子的戶口遷到倩文家。那年秋天，筆者把兒子的戶口遷回，當時紅衛兵把門，看上去不過是些初中生。一女紅衛兵看見筆者問：「這個也是混蛋嗎？」隊長制止了她，並喚出倩文辦理了遷戶口手續。

解放前，十小姊樂盼文及十一小姊樂絢文都是貝滿女中的學生，盼文後考入輔仁大學，她是姊妹中相貌出眾、長得最清秀的人，追求者甚眾。絢文高中畢業時，一九四八年，一位常來中國的美國毛神父要帶二十幾位中國青年赴美留學，其中包括盼文、絢文和她們兩個姪輩——十一爺樂肇基的一雙兒女：兒子樂藍及女兒愛琳。臨走之前，盼文和絢文難捨北京小吃，什麼豆汁、焦圈、爆肚、豌豆黃……等等，她們盡情吃了個夠。到了美國，盼文較文弱，只能為照片著色，掙些小錢貼補零用；而絢文則大刀闊斧地到餐館拖地板、洗盤子，幹力氣活。至今一個甲子過去了，她兩位已年逾八旬，均未結婚。最近聽說她們兩人各居一地，每晚七點半是絢文與愛琳通電話的「法定時間」，她們一說就是一個小時。

## 大哥與二哥

四房大哥樂肇基，在家族內十三世排行十一爺，他是十三伯父的獨子，性格與乃父迥然不同。十三老爺樂達明為京城有名的嬉鬧大家，有些玩世不恭。肇基的相貌也不甚似

其父，他生得高挑身材，很有幾分清秀，稍顯清瘦，帶有明顯的書卷氣。他從十二歲起即赴津跟隨伯父樂達仁，在伯父身邊長大。樂肇基的氣質、行為等多方面都受到伯父的直接影響。他在伯父身邊二十年，所以說他最有資格繼承伯父的衣鉢。中藥必須改革，這早已是七伯父樂達仁的既定方針，而改革中藥先要借重化學，因此一九二四年肇基自南開大學化學系畢業後，七伯父遂任命他為達仁堂副經理。此後不久，又讓他赴歐考察半年。

樂肇基性格內向，不善言談，無事時常不發一言。筆者親見他在津飯店遇到熟人，先握了一次手，三言兩語寒暄後，他又握了一次手。第二次握手，何意？Bye bye也！

肇基與筆者岳父賈富文（天津公安醫院院長）是同窗好友，二人過往甚密，但他二人都不喜講話，常是對面枯坐，而兩位夫人卻有說不完的話。兩家有著幾十年的交往，慶枝大嫂經常麻煩筆者岳母說：「金慧啊，你幫我把這個弄平……，把那個擺好……」二人親密無間。在筆者訂親之後，大嫂對筆者岳母假多於真半開玩笑地說：「今後我要叫你一聲姻伯母了！」岳母忙說：「咱們這麼些年的情誼了，您永遠是我的大嫂。」筆者和夫人在北京結婚，婚後到天津回門，由岳父請一桌客，大哥、大嫂、三哥和三嫂都出席了。筆者沿桌敬酒，唯獨落下大哥及岳父。夫人不解其故，筆者解釋說曰：「今天大哥就是我的家長，當然要最後敬酒了！」三嫂沈恩秀湊趣對三哥說：「Poly，你坐這裡陪弟弟，我去陪弟妹。」當去肇基家道謝時，發現他們夫妻各有一個衛生間，大哥衛



生間的全部器皿是粉色的，大嫂衛生間的器皿是天藍色的。大哥關心地對筆者說：「你們就這麼兩天假，該玩就玩去，別管這些俗禮了！」

他們有一雙子女，二十世紀四〇年代中期就移居美國了。姊姊愛琳，幾年前回國一次，她酷似其母。弟弟樂藍，近年來見過兩次，驚奇地發現他年近八十，卻健步如飛。飯店餐廳內有一盤蔥花餅，非常香脆。樂藍邊吃邊誇道：「幾十年都沒吃過這麼好的餅了！」自他們姊弟倆一九四七年去美後，大嫂就倚門盼信，每週一信怎能解大嫂的思念之苦啊！

樂達仁管理達仁堂時，曾根據南北氣候不同、服藥習慣各異等情況，要求達仁堂在各分店製出適合當地需要的成藥。此外，北方飲片不及南方的講究，因此達仁堂雖在北方，也使用南方師傅。所以北方達仁堂各分店的飲片也很有鮮明的特色。總之，達仁堂從精選地道藥材到到位的炮製，層層把關，一定要做到貨真價實，不可用「物美價廉」來瞞哄購藥人。肇基將先伯父的肺腑之言銘記於心，身體力行，在此基礎上還有所發展。

鋪規既定，必須嚴格執行。天津達仁堂有一本《言出法隨錄》，是專門記載重大違規記錄及處罰意見的。肇基恩威並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除嚴格進行企業管理外，同時非常關心員工生活，在日偽及國民黨時期，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樂肇基不時給員工加薪，亦給予各種補貼。日寇入侵時，天津淪陷前後，不少達仁堂的員工為了家人的安全，紛紛請假回鄉，肇基一律照准。而對堅守崗位、留下的員工，則是有獎勵的。一九三七

年年底，局勢初定，肇基有一告示：「……今賴留守同仁在此危難之際，猶能各司所事，安心服務……本號亦略致薄酬……以表微悃。」

樂肇基沉默寡言，員工們背後都稱他為「啞巴老闆」。實際上，他是「暖瓶式」企業家，外冷內熱，讓人覺得似乎不好接近，但他心地善良，寬於待人。他要求員工們對顧客要真誠，和善相待，面帶微笑，尤其是抓藥時不允許發生任何差錯。他常說藥店不比其他行業，不合適可以換。藥品直接關係到病人的生命，所以他要求抓藥人要在每味藥包裝紙上蓋章。

肇基很注重製藥機械的改進，淘汰落後的生產技術。<sup>2</sup>他運用自己學到的化學知識，逐步摸索出一整套改進中藥劑型的工藝。一九五三年九月，達仁堂製藥廠終於推出了銀翹解毒片及牛黃上清片等四種中藥片劑，成為中藥最早的劑型改革成功案例，可喜可賀。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解放初期，樂松生參加中央土改工作團時，認識了鄭啟棟教授，他是北京大學藥學系教授，同時兼任北大藥廠副廠長。返京後，松生給鄭教授送去一包銀翹解毒丸的藥料，鄭教授把它製成顆粒，再壓成片，每次病人要服用這種○·五克的藥片十六片。鄭教授說：「哪有一把一把地吃藥的？藥材必須提煉加工。」不久，鄭教授拿出《中藥劑型改進研究的初步方案和進行步驟》。經樂肇基、樂松生及鄭啟棟

2 參考楊國瑄《達仁堂的故事》，天津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五月版。

三人討論後，決定聘請鄭啟棟為達仁堂改進室的總技師。經過三年多的試製，終於研製出療效相同但體積小、重量輕、便於服用和攜帶的中藥片劑。

肇基還有過一次打破傳統習俗之舉，即在十三伯父樂達明去世時，在開弔那天沒有披麻戴孝，也沒有按照常規履行跪拜等喪儀；而是穿上大禮服，與其妹樂曼雍一道，向弔唁諸客大行鞠躬禮。在上世紀三〇、四〇年代，如此之舉還是頗為罕見的。

曼雍姊是十三伯父的獨女，在四房中排行第三，所以大家都叫她楊三姑奶奶。她公公是清末著名人物楊度先生，丈夫是化學名家楊公庶。他們有二子二女。二子是楊友龍、楊友麒，兩人都做出突出成績，國際聞名。

樂肇基雅好音樂，喜彈鋼琴及拉小提琴。他一生收藏了九把義大利名貴小提琴，其中一把為名揚世界的「克雷莫納」小提琴，此琴乃最著名的製琴名家史特拉第瓦里所製。美國國際小提琴大師海菲茲曾說：「能看一眼『克雷莫納』琴，不枉一生。」京劇名家楊寶忠每來天津，必拜訪肇基，並要求說：「大爺，拿出琴（指『克雷莫納』）來讓我拉上幾曲吧！」一九六六年紅衛兵前來抄家，肇基懷抱「克雷莫納」鄭重地對孩子們說：「這可是件好東西，請你們把它交給國家，今後會有用的，你們千萬不要毀了它。」不久，他患病身故，終年六十多歲。

三哥樂釗老實寬厚，雖不似乃兄有「啞巴老闆」之稱，但話也不多，是一名實幹家。他年輕力壯時，廣平庫葡萄熟了，曾給客人騎車送貨。花甲之年在北京薊門橋購一小房，

仍親自安家運物。樂釗於二〇一一年去世，享年九十歲。他有一子三女，都從事中藥業。三嫂沈恩秀比三哥活躍多了，經常參加社會活動並熱心公益活動，幾次與大嫂譚慶枝一道出資捐獻。解放初期，她曾登台演過「十大姊」節目。一九九九年，她寫了一篇〈跟著共產黨走〉的回憶往事的文章，發表在《我與天津五十年》上面。

在二十世紀七〇年代，在萬安公墓邂逅三哥三嫂，那天上午他們同至墓地為三哥生母奉安，由他們之子士銘手捧七伯母的骨灰盒。筆者與他們簡談數語，匆匆告別。

## 四哥樂錡

四哥樂錡是七伯父樂達仁的次子。他從十幾歲就到美國留學，後來移居美國，中間回國幾次，所以筆者僅在他回國時見過他兩回，但他給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他大排行是筆者二十一哥，生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戴一副白色無框眼鏡，更顯得文質彬彬，相貌堂堂，清秀俊朗，風度翩翩。他經常含笑待人，而且有著歐美人的活潑氣質，言語詼諧，善於幽默。他曾一度號為鐘琪，乃因四嫂夫人是上海美女，名中有琪。

筆者曾送給至親好友楊友龍先生一篇拙文〈樂家老鋪的譜系與軼事〉，他帶到美國請四哥審閱。四哥對全文予以肯定，但對達仁堂在香港開有分號一事存有疑問，他說：「過去有過假冒達仁堂名義的事件，所以文中所謂達仁堂在香港有分號未必是實。」但事實

上在香港確曾開過達仁堂。證據有二：一是樂松生二哥（大排行是十三哥）在《工商史料》（I）一書中的〈北京同仁堂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提到，達仁堂在香港有分號。二是聽原為達仁堂員工、後來是中藥研究所的同事常崇光師傅，詳述過達仁堂在香港開設分號的始末：在香港開設達仁堂分號一兩個月後，趕上一九四一年底日本突襲珍珠港，旋即美國向日本宣戰，因此香港的來往船運有了嚴重阻礙。於是香港達仁堂在剛開張兩三個月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停業了。

四哥在此期間，與國內親人資訊阻隔，情況不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當時在美國已應徵入伍，為海軍效力，成為一艘軍艦的海軍戰士了。他與全艦戰士一道打擊了日本入侵之敵，當時說的是英語，周圍、上鋪下鋪都是美國人，幾乎忘了自己是個「中國人」。在這樣的環境下，他怎能知道在香港還有個僅僅開了兩三個月的達仁堂分號！

七伯父樂達仁事母至孝，想到老母中年孀居，多年教養子女之不易，他五十多歲時還有過一次萊彩娛親，演過一次《青石山》，七伯父、十三伯父、松生二哥飾演主要角色。三哥樂釗時年十歲，四哥樂錡時年八歲，他二人還穿蓮花瓣的戲衣扮演劇中小角色，讓祖母很是開懷。

達仁堂為四哥積攢下十萬美金，隨之大家也注意到四哥的衣著。一次四哥回國住在上海數月，當時洪鈞陶表兄也在上海，他們經常在樂篤周家會面。後來大家熟悉了，據鈞陶表哥說四哥如此有錢，有成行的各式黑黃皮鞋，但無白色皮鞋。

一九四五年前後，四哥樂錡在美國休士頓航空公司任電子工程師，還是電腦管理部的經理。一九九四年，達仁堂製藥廠建廠八十週年時，他曾回國到天津參加慶典。

他中年時，有一次來北京看望親友，父親與筆者請四哥到東來順吃涮羊肉，有九姊樂倩文作陪，席間言談甚歡。他談到在美國，與國內來的眾親友都互叫乳名。國內大多數成年人對自己的乳名都很避諱，更不敢輕易提長輩的乳名，因為年輕人直呼老年人的乳名通常是不禮貌的行為。在他這次回國期間，筆者還見到與他一道回國的親戚正在算旅途中的花銷，一點不含糊，分角必清。當時筆者真是有些吃驚，歐美人都是絕對的AA制。國內雖有「親弟兄，明算帳」之說，但絕大多數同學相會、友好聚餐都是搶著付帳，中外習慣大相逕庭。

四哥樂錡夫婦有三個兒子，分別是樂大春、樂大年和樂大中。四哥乳名老春，長子名大春，顯然有父子相承之意。樂大春之子名宗達，顯而易見的是緬懷孩子的曾祖父樂達仁先生之意。大春之女名美龍。

四哥患有美尼爾綜合症多年，暮年時每天只能坐在沙發上，在房頂繫一粗繩供四哥站立時拽拉之用。這時，他站起來都煞非易事，每次站立起來需二十分鐘。後來進了一家養老院，二〇〇九年去世，享年八十六歲。四哥病痛之軀，安息對他也是一種解脫。



一九三四年，樂達仁率老四房兒孫輩給母親祝賀八十壽誕。



樂倩文（左）和夫婿倪尹明



筆者的七伯父樂達仁